



田升著

辦公室主任詠嘆調

海天出版社

办公室主任咏叹调

田升著

海天出版社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杨发河

装帧设计 陈士修

插 图 庄锡龙

办公室主任咏叹调

田 升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17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80542-876-X/I · 211

定价：6.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长篇小说《办公室主任轶事》的续集。作者以“吃尽了酸甜苦辣、饱尝了人间风雨”的生活体验，用轻松、诙谐、幽默的笔调演绎成一串串惊世骇俗的故事，让你一旦闯入作者启开的心灵世界，就难以走得出来。你于是忘记了自己，沉溺于作品中各色人等的喜怒哀乐之中，发出含泪的笑、苦恼的笑、会心的笑，从而引发出人性的良知和沉重的思考。本书立意新颖，角度独特，突破了长篇小说精雕细刻的写法，采用粗线条、多视角、纵横交错、毫不关联，实为一体的手法，展开了与“我”相关事件的描绘。反映了经济特区生活的一个侧面，勾画出一幅人间百态图，唱出了一首首节奏明快的咏叹调。

气和毅力啊！诚如顾笑言为本书作序所云“文学创作这个领域，大门好进，台阶难上”，“田升的《办公室主任轶事》无疑是个很好的开端。大门是进了，摆在面前的是无数攀向更高处的台阶。他有爱心，也有雄心。”

田升的雄心、勇气，不仅表现在他敢于以横戈跃马之势闯荡文坛，而且还在于他敢在作品中无情地解剖自己。卷首对其 20 多年来办公室主任所充当的种种角色的自嘲，字里行间不乏对自己被磨光了的棱角，被扭曲了的个性等“劣迹”作了曝光。如成了凡事“左右逢源，不偏不倚”的“八级泥瓦匠”；甘当“息事宁人”的“消防队长”；荣任“美食家”：“沾客人之光，常品山珍海味，尝遍八方小吃”，“远近大小酒家、风味特点”，“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而最最难堪的，则是“各种面孔都得看，各种话都得听，苦水咽下去，却装出一副潇洒。”透过这近于调侃的自白，我们可以窥看到作者无可奈何的心态：为了能“在夹缝中行走，在曲径中寻找出路”，只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胜任办公室主任的秘诀，也是作者 20 多年来立于不败之地的经验之谈。这对于某些认为办公室主任是个“肥缺”者，可能奉若至宝，甚或加以发扬光大。但对于是非分明，对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对祖国和人民充满强烈的爱的田升而言，却隐含着深沉的烦恼与厌恶。显而易见，倘若不是为了顾全大局，一身凛然正气的东北硬汉子，是

决不违心甘当 20 几年的“爬山队员”的。因此，我在敬佩作者敢于亮短之余，也深为其奉献精神所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熟悉生活是作家的基本功。田升既有勇闯文坛和正视自身弱点的胆识，也具备了熟悉生活的基本功。连任一个大企业 20 多年的办公室主任，使其有机会深入生活，广泛接触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上自部里的大员，下至勤杂工。权充过“参谋总长”、“礼宾司司长”、“中转站站长”、“总务管理员”。大凡公司的迎宾送客，红白喜事，采购分物，等等，等等，皆离不开他一手操办。因而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体验殊深。或讴歌先进，或抨击落后，顺手采撷，皆成文章。有力地印证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至理名言：“真正的艺术作品只偶尔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产生，那是从他所经历过的生活中得来的果实，正象母亲的怀胎一样。”（《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184 页）

《办公室主任轶事》虽然是作者的处女作，但其艺术魅力却不容忽视。本书立意新颖，角度独特。它突破了长篇小说精雕细刻的笔调，采用粗线条、多视角的手法，围绕“轶事”二字，展开 50 多个与作者有关的故事描绘。纵横交错，貌不关联，实为一体。为我们抒唱了一首首都市咏叹调，刻画出一幅人间百态长卷。严肃但不板起脸孔，幽默绝无庸俗之嫌，初露作者的讽刺艺术才能。

讽刺艺术在我国文学上颇具传统，清代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敬梓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的出现，把我国的讽刺艺术推向高峰。幽默大家鲁迅在这些传统的基础上，更使自己的小说和杂文放射出耀眼的讽刺光芒。关于幽默，他有过精辟的论断，指出：“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这是因为倘若目不转睛地正视着人生的诸相，我们便觉得倘没有幽默，即被赶到仿佛不能生活的苦楚的感觉里去。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泪和笑只隔着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鲁迅译文集》第3卷第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王蒙也曾一语道破：“幽默是一种酸、甜、苦、咸、辣混合的味道。”（《风格散记》，载《中国》1985年第3期）田升已经具备了如此“深的修养”和气质，也尝尽了“酸、甜、苦、咸、辣混合的味道”，所以能走向幽默，并逐渐形成其风格。

田升的幽默风格，首先表现在人物的描绘之中。纵观其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多数具有悲喜组合的形态。而这种亦悲亦喜的形态，既体现在众多 人物的鲜明个性之中，也体现在他们共同的心理模态之中。就个性而言，田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或多或少带有荒谬可笑的特性，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嘲笑。而这种嘲笑则总是达到超越具体对象和具体个人的层次，怀着深深的惶悯去剥开在喜剧性性格和行为

中包含着的悲剧性。这些人物的可笑之处，也正是他们的可悲之处，性格中的悲喜因素由此浑然一体，从而激起了人们的喜剧性兴奋和深刻的悲哀之感——幽默的审美效应。

满脑子梦想高升的金厂长，虽是坐“直升飞机”升任厂长之职，但仍未填满其升官欲望。他自命不凡，自认精力过剩，祈求继续高升大展拳脚。无奈山高皇帝远，唯一能决定他命运的张部长在省城极少下来，对他不甚了然，错失了多次重用机会。于是心血来潮，“一天一个电话，两天一封信，没完没了的汇报思想工作”，还“每隔一星期，他亲自往省城跑一次，当面汇报”。烟酒礼品，络绎不绝。在张部长面前，更是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将肉麻当有趣。浅薄、无耻，俗不可耐。甚至当张部长深表厌恶，声明“不喜欢恭维”时，他还误认为是反话，执迷不悟。作者对金厂长性格中可笑因素的嘲讽，真是入木三分，维妙维肖。接着笔端陡然一转，标明了金厂长的可悲下场：只因错失接送张部长的时机，自感升官无望，导致精神分裂症，逢人便说：“他走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这则悲喜剧故事里，作者并不简单地让金厂长充当笑料，而是通过他揭示了膨胀的官欲对人的可怕异化——使人失去人格尊严，变成一个无价值的存在物，深藏着人类的悲哀。

金厂长一类人物的可笑可悲之处，归根结蒂来自精神的弱态、性格的病态。似已病入膏肓，无药可

医，但毕竟为数不多。而《大厅里的柱子都能照出人儿……》中的小丑群相，如贪婪的局长及其夫人，趋炎附势的局长秘书、无奈圆滑的财务科长，却是司空见惯，似曾相识。他们神志清醒，心怀叵测。为了推销名牌手表，财务部颇费口舌请来局长。局长“趁人之危”赶来打秋风，一餐吃去3000多。局长秘书“善解人意”，帮局长夫人弄得一块名表，花钱又送表，这无异于切肉出血。但惊得“两只眼睛直发愣”的财务科长，却转而谄谀取容，对局长及其夫人谢声不绝。如此皆大欢喜的闹剧，如此被扭曲了的性格特征，实属可笑。但席终人散，财务科长眼巴巴地盼了两个月，不见局长签字的报告，只闻局长正受审查，“他颓然跌坐在沙发上”长吁短叹。我们的笑容，也同主人公一样，消溶在悲哀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沉重感，是对这些畸形人物和不正之风的思索。

值得指出的是，田升在描绘人物过程中，鉴于篇幅有限，更多的是运用了漫画式手法。他对所要讽刺的人物加以类型化的艺术处理，使他们个性模糊，种类属性清晰和明确，成为体现某种社会心理特征的脸谱式人物。法国著名哲学家、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柏格森曾有过“悲剧描写个性，喜剧描写类型”的论断（《笑之研究》，载《西方文论选》下册，第2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此虽过于绝对而失之偏颇，然类型化可以酿成喜剧性却是一条重要的艺术指导原则。田升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法。

《阮副部长也不由自主随之而摇晃……》中，对部属柳溪天飞、天达、天鹰 3 家公司的头们作了粗线条的、漫画化的勾勒，以“特写镜头”摄取他们性格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心理特征。这 3 组人物的精神面孔有惊人的相似，又吻合柏格森提出的“在同一剧本中描写同一模型的不同摹本”的方法（《笑之研究》）。以此突出喜剧气氛，造成幽默的效果。我们不妨摘引原文为证：

阮副部长乘坐从北京出发的班机，因故晚点一个钟头，但见“柳溪机场候机楼前广场上，摆满了一排崭新的小轿车”，他们是部属“3 家公司的老总副老总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和办公室主任秘书一类的人物。往常，他们忙得脚打后脑勺，这会却轻松地站在秋天的太阳底下，聊天，笑骂”，“用这样的方式和内容消磨时间，而且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等待着即将要从本次班机走下来的同一个重要人物。”

“然而有趣的是，3 家公司的头头们谁都不肯讲出自己是来接阮副部长的。他们有意回避迎接对象，话题一到嘴边就岔开，尽扯些鸡毛蒜皮的事，却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再瞧瞧他们抢接阮副部长的镜头：“3 家公司的头头们一拥而上，把阮副部长围个水泄不通，争着和他握手寒暄。接着便是七手八脚，乱作一团，都去扯阮副部长乘坐自己的车，请他到自己的公司，把一个能指挥几十万大军的阮副部长拉得前倾后仰、东倒西

歪，顿时感到两眼发黑，天昏地暗，一屁股坐在地下，动弹不得。”

田升的幽默风格，还表现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中。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的情节，实际上就是对一定事件的处理。这种处理可以根据作者意图和人物性格而异。同一个故事，或可处理为喜剧、悲剧、悲喜剧，或可处理为正剧。其间风格起着很大的作用，“风格的使命是把显露在生活素材和创作对象中的不同类的因素融合为一个能动的整体”（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1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幽默风格是田升结构情节的一种审美聚合力，在这股力量的催动下，他颇为出色地组织两种不同类型的情节结构。

头一种类型是富有思想概括意义的喜剧性情节。以《我在意念上把假当真……》为例，小说的主人公马其安，为了弥补过去，决定给妻子买金项链，但因多管闲事，竟被不良青年骗去1000元。他诚恐妻子伤心，只好忍痛以假当真。马太太初时兴高采烈，后来认出是条假金链。懊丧之际，却又怕丈夫承受不了打击，同样以假为真。最后，正当“我大姐”医生要戳穿这破绽时，马其安夫妇同步抢前夺回项链，并同时重复“真的，真的！”，“我大姐”也终于恍然大悟，也只好同声附和。真是洋相出尽，笑声不绝。这一连串的喜剧情节，生动地表现了马其安夫妇心心相印、体贴入微的鱼水之情。《我情不自禁地说了声“谢谢”…

…》读后不禁捧腹大笑。钱副厂长日子不顺，连连出事，先是钱太太在家摔断了两根肋骨。接着是钱副厂长糖尿病复发住院。再接着是波斯猫打破钱副厂长价值连城的花瓶。他一气之余将猫送人。钱太太伤心至极。于是，他怪罪于办公室主任。因为那晦气的电话号码和房号，都是办公室主任给安的。不信，你看看：电话号码 728427，钱太太正好是 7 月 28 日那天摔倒的。427，就是“死儿妻”。房号 144，叫穿了就是“要死死”。为逢凶化吉，办公室主任奉命请人改号。作者正是借助这些近乎荒诞滑稽的喜剧情节的安排，对主人公钱太太肆意揶揄嘲讽，令人在哑然失笑之余，对惴惴不安的办公室主任深表同情，对妻仗夫势的恶行横加挞伐。颇具深度。

第二种类型是悲喜剧的情节。它通常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是在喜剧形式里包藏着悲剧的内容，即俗称“含泪的喜剧”；另一种则是在悲剧形式里包含着喜剧内容。悲剧性和滑稽性两者并不单纯同时存在，而是处于更为复杂的辩证关系。正如弗雷里赫所云：“在悲喜剧中，悲剧性的东西和滑稽的东西是互相过度、互相转化的，而且是互相通过对方而实现的”（《论悲喜剧》，载《电影艺术译丛》1979 年第 3 期）。《老头眨巴一下眼睛……》不失为一出构思精巧的成功的“含泪的喜剧”。主人公王局长是个出名的孝子，为遵母嘱，他不将老人尸体火化，而是星夜运回老家，拟埋黄土高坡上。于是，在哭声未断之际，演出了一幕

运尸闯关的喜剧。因为此处离王局长的家汽车需跑8小时，还得经过关口，要停车检查。没有死亡证明，怕惹麻烦。只好将老母未寒尸骨装入电冰箱的包装箱子里，佯装电冰箱。过关时，王局长主动给守关老头递烟拉家常，终于蒙混过关。看看文末对话，委实滑稽可笑：

老头深深吸了口烟，斜眼看了一下王局长，问：“拉的啥？”

王局长脱口而出：“没啥，一台电冰箱，给兄弟结婚用的。”

老头走到汽车后面，打开车门，用手去推“电冰箱”，推了几下，没推动。我的心怦怦直跳，心想：“八成要漏馅！”

谁知老头却问了声：“便宜吗？”

王局长苦笑道：“便宜倒不便宜，这年头哪有便宜的！”

老头眨巴一下眼睛，把小旗一扬，说：“走吧！”

死人这本是令人悲哀痛心的，何况对于一位出名的“模范儿子”。但读完这结尾，就连如释重负的王局长及其亲属，也会破涕而笑。整个情节的发展，正是从悲哀走向滑稽。事件和人物的欢笑外壳，包藏着悲哀的内核。前者是过程，后者是实质，它们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收到了颇为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

田升幽默风格除了表现在人物描绘和情节结构之中，叙述笔调的幽默也是一个重要标志。他追求着一

种清丽质朴的语言，往往不作很多的文饰，不追求文字的俏皮，未出现过油滑的倾向。藏锋芒而不露，隐幽默于平淡。《西瓜呀，西瓜……》以秘书的日记形式展现在读者眼前，文字简约，平淡无奇，但读来却心潮起伏，感喟万端。让我们看看其卷首、结尾两段：

“星期四 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 32 度

主任给我个好差事——分西瓜（注意：“好差事”一词，是对我分配的工作多少有些不满意）。这可难住了我，分到大的，高兴；分到小的，有意见。别人无所谓，唯她我得罪不起。她在他枕边吹一次风，就够我喝一壶的。”（“他”指总经理，“她”指总经理夫人。笔者注。）

“西瓜呀，西瓜，你为何不长得一样的圆，一样的大？该死的主任，给我找了这样一个好差事……”

这首尾呼应的短言碎语，看似平常，但内中包涵着几多辛酸苦辣，更是对那些绝对平均主义的自私自利者的无情嘲讽，也是对那夫荣妻贵、盛气凌人的衙内们狠着一鞭。平中见奇，发人遐思。

对于造成小说的幽默来说，作者的幽默态度至关重要。按著名作家王蒙的概括，幽默的态度应该“是一种亲切、轻松、平等感。装腔作势、藉以吓人是幽默的对头”，“幽默的灵魂是诚挚和庄严。”（《风格散记》，载《中国》1985年第3期）纵观全书各篇章，田升的幽默风格之所以能深为读者接受，产生较为强

烈的艺术魅力，这是与其诚挚、严肃的创作态度不无关系。对于被人称为“铜头、铁嘴、蛤蟆肚、飞毛腿”的苦差使办公室主任而言，常常会有出力不讨好、被人指着背脊梁臭骂不休的事发生。但田升始终与人为善，那怕对于某些令人深恶痛绝的缺德事，也没有装腔作势，或幸灾乐祸。而是用诚挚的情感，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剖析事物，抨击丑恶，从而形成独特的幽默风格，并逐渐走向成熟。

(原载“特区文学”1993年第1期)

含泪的笑 会心的笑 苦恼的笑

——田升作品的讽刺艺术浅谈

□倪鹤琴

深圳文坛能够或者已经出书的不算少，而一本书能见其独特风格的，不算多。这方面，田升大概是有点天才的。一部《办公室主任轶事》（以下简称《轶事》）没有传统意义上一以贯之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大肆铺陈渲染的环境氛围，却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我的视线。

田升作品的独特风格，来自其讽刺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世界文学史上，讽刺艺术传统由来已久。伊索和莱辛的寓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的《阿Q正传》……。无论是辛辣的讽刺还是善意的讽刺，这些都成为讽刺文学的精品。我不敢说田升的作品能与此相提并论，可是拿起他的《轶事》，我的的确确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心都是火热的，他们的爱憎是分明的，他们的情感是最真挚的，而他们的艺术表现是力透纸背的。田升作品中

同样或多或少反映出来的这几大特点，使其作品艺术上的苍白面（如布局的平板、表现方式的单一、艺术加工的粗糙等等）显得不再那么触目，而在讽刺这种艺术形式的自如运转上使他与伟作家的距离缩短了。

讽刺总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借助夸张的表现。事物的夸张、行为的夸张、语言的夸张等等。让生活中的原生态在放大镜下放大，让现实中的人在哈哈镜前变形，丑恶的更可恶而激起人的义愤，可笑的则在变了形而有几分滑稽的外壳中钻出可爱的灵魂。田升没有亦步亦趋。同样是面对社会问题，时代变了、地域变了、对象变了，讽刺的轻重厚度与角度也就不同。作家面对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和事，要赞扬或批评的是他同一队伍里的同志（当然不是以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为界限），或上级或朋友或下属，这就意味着，当他准备拿起讽刺的武器作全方位扫描时，那种热肠那股挚情已激活得他无法放弃痛苦的选择，唯一可做而且必须做的，是如何准确掌握同一的社会准则和价值尺度，对人间百态千事作出恰如其份的艺术表现。

田升这样做了。做得怎么样？办公室主任亲写“办公室主任轶事”，“写真”味甚浓，难免招人“对号入座”。可是，如果仔仔细细地读一读“轶事”，看一看万花筒里走出了什么样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作家如何把握如何来表现，那么，我在由衷欣赏作家的创作勇气的同时，也想到了明智的读者一定会悟其善意